

俄藏利玛窦《世界地图》札记

高田时雄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前言

明朝末年耶稣会士渡海来到中国,在从事天主教传教工作的同时,也将欧洲的科学知识传到中国,这是中西关系史上最重要的功绩之一。在这些耶稣会士中,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可谓贡献最大,尤其是他的《世界地图》以图片形式显示了世界的真实面貌,让许多知识分子耳目一新。其后,经过明清的政权易主,虽然未必能说这些新的地理知识已经普及到中国整个社会,但其影响如伏流般广为扩展,随处可见它的痕迹^①。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很早就传入日本与朝鲜,可以说相较于对中国的影响,它在日本产生的影响更大。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包括刻本与写本,有许多在日本保存至今,这个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②。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前后共有五种,分别是万历十二年(1584)王泮刊行于肇庆的世界图、万历二十八年吴中明刊行于南京的《山海輿地全图》、万历三十年李之藻刊行于北京的《坤輿万国全图》、翌年万历三十一年同样是在北京由李应试刊行的修订版《两仪玄览图》以及最后于万历三十二年前后由冯应京刊行的地图^③。其中,原刊本流传至今的是《坤輿万国全图》及其修订版《两仪玄览图》这两种,前者传本比较多,而后者为人所知的不过两种而已^④。

关于万历三十年李之藻刊行的《坤輿万国全图》,除了不完整的以外,到近年为止其存在为人所知的共有以下七件^⑤:

① 具体事例详见[海野 1985]。

② [土浦市立博物馆 1996]附载的《坤輿万国全图所在一览》中列举了日本、中国、韩国收藏的刊本及写本的《坤輿万国全图》共 28 件,其中有 24 件是日本国内的收藏品。

③ 关于利玛窦制作的各种世界地图详见[洪业 1936],[鲇泽 1953]。

④ 一藏于韩国首尔的崇实大学校博物馆,一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不过有证据显示日本过去也有过该图。

⑤ 以上诸本为[Day 1995]111 页以降、[黄·龚 2004]137—147 页所收罗。

- 1 梵蒂冈图书馆 I(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1a 梵蒂冈图书馆 II]^①
- 2 宫城县立图书馆^②
- 3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③
- 4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④
- 5 菲利普·罗宾逊(Philip Robinson)旧藏本
- 6 奥地利国家图书馆(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 7 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对于其中的 5, [李孝聪 1996] 认为“现下落不明”, [黄·龚 2004] 亦沿用此说, 但这应该出于某种误解。1988 年 11 月 22 日在伦敦的苏富比将菲利普·罗宾逊旧藏品交付拍卖时, 该地图为法国收藏家亨利·希勒(Henri Schiller)拍得, 现在在其手中^⑤。由于是个人藏品, 不能轻易看到, 但其下落是明确的, 并非“下落不明”。

至于 6、7, 学者认为并非万历三十年的李之藻版, 而是以李之藻版为底本的清代的摹刻本。关于这个问题, 下文将会提及。

在以上七件之外, 最近又有新的版本出现于香港的拍卖市场^⑥, 成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詹姆斯·福特·贝尔(James Ford Bell)图书馆的收藏品^⑦。根据拍卖目录, 似乎过去是为日本的个人所收藏的。

此外尚有德理贤(D'Elia)介绍过的一件^⑧。关于此图, 只知道这是原任驻日本外交官的

- ① 梵蒂冈图书馆 I 由[D'Elia 1938] 公开出版, 是迄今为止最广为人知的版本, 但难以理解的是[D'Elia 1938] 完全没有提到梵蒂冈图书馆 II。最早提及该版本的大概是[Sotherby's 1988], 该书指出“*There are two copies located in the Vatican, one defective and in poor condition*”(79 页)。此后, 在梵蒂冈进行古代地图调查的李孝聪教授也承认存在两种版本, 写道: “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两个印本, 其中一个印本, 每块条幅上有手写的号码。另一印本, 版式完全相同, 但有轻微破损。”([李孝聪 1996] 世界图第 1 页。)在相同时期, [Day 1995] 将其表示为 Vatican I、Vatican II, [黄·龚 2004] 亦加以沿用。笔者虽然暂从其说, 但对其存在并非完全没有疑问。因为 1989 年秋访问梵蒂冈的 Day 氏, 未能亲见 Vatican II, 只是听了馆长 Stickler 红衣主教的说明确认了其存在而已, 而李孝聪教授对于 Vatican I 明确记下其编号为 Barberini Orient. 150, 但对 Vatican II 却未记编号。如果胡猜乱想的话, 李教授的上述说明, 或许是依据了[Sotherby's 1988], 实际上并未见到原物。因此对梵蒂冈图书馆 II 进行最后的确认, 应该有待于今后的再次调查。
- ② 有京都的临川书店 1997 年影印本。
- ③ 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北平禹贡学会的影印本,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一部分受到修改。现在可在 <http://edb.kulib.kyoto-u.ac.jp/exhibit/maps/map001/image/index.html> 看到其精细的图像。
- ④ 仅存椭圆形的地图部分, 至于利玛窦的序文、九重天图、天地仪、赤道北地半球图、南地半球图等配置在周围的部分都被切去。然而由于是较早的印本, 磨灭部分较少, 而且似乎不常使用, 因而损伤也不多。严格地说当属残本, 但由于地图部分保存完整, 故暂且置于全本之列。
- ⑤ 笔者得到了希勒氏现在仍藏有该地图的准确信息。[李孝聪 1996] 指出“1988 年亨利·希勒购买了该图; 1991 年该图又见于索斯比拍卖行的拍卖目录第 86 号”, 其所谓第 86 号正是 1988 年拍卖目录的号码。参看[Sotherby's 1988] 79—80 页。两次拍卖都用同一号码是难以想象的。
- ⑥ 佳士得(Christie's)拍卖会, 2008 年 12 月 2 日于香港: 拍品编号 1948。
- ⑦ 现在可在 <https://www.lib.umn.edu/bell/riccimapp> 看到其图像。明尼苏达大学的收藏品当是在佳士得拍卖会上中标拍得的, 比较两者的图像后很容易发现这一点。
- ⑧ [D'Elia 1961] 115—116 页。

德人福雷奇(E. A. Foretzsch)于1929年在日本买到的,1958年转到美国人手中,现在的收藏者不明。德理贤主张这是所谓“工人摹刻本”^①,尚未得到普遍赞同^②。

再者,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à di Bologna)藏有第一幅与第六幅^③。又据说梵蒂冈图书馆除了上述的两种以外,尚有清代补刻本的残图三幅,但详情不明^④。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刻本的现存情况如上所述,但现在有幸能够加上俄国所藏的一件。小文对该图进行简单的介绍。

一、地图的来历

俄藏《坤舆万国全图》是圣彼得堡的俄国国家图书馆(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的藏品,编号为ОР, Дорн 770。附带一提,ОР是Отдел рукописей(手稿部)的简称,Дорн是[Dorn 1852]的目录号码^⑤。该图书馆的《中国刊本写本目录》[Яхонтов 1993]将其列为第16号,解说是“《坤舆万国全图》。木刻本,6幅,64 x 179[cm]。利玛窦(1551—1610)制,刊年是万历壬寅(1602)。有杨景淳、陈民志的两篇序跋。彼得·杜布罗夫斯基(Петр Дубровский)收藏品”^⑥。仅提到杨景淳与陈民志的序跋,未及谈到关键的利玛窦、李之藻以及吴中明、祁光宗的有关内容,这只能说明其不完备,不过现在可以暂且不提。重要的是它明确记载了该地图是杜布罗夫斯基的收藏品。

彼得·杜布罗夫斯基(Петр Дубровский, 1754—1816)大名鼎鼎,因为他大量地将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西部贵重的古代写本引进俄国。圣彼得堡的俄国国家图书馆是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于1795年创建的,1814年作为帝国公共图书馆(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Публич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正式开馆,是俄国最古老的图书馆,而杜布罗夫斯基的收藏品与扎乌斯基(Załuski)的收藏品^⑦一起成为该馆最重要的部分。尤其是扎乌斯基收藏品离开俄国

① “工人摹刻本”是指刻工为了营利根据李之藻版进行摹刻者。利玛窦本身谈到了其存在。参照[D’Elia 1949]473页;[洪业 1936]25页;[鮎泽 1953]9—10页。

② 据[D’Elia 1961]介绍,该地图的特点在于施加了彩色、没有耶稣会的印章、第六幅下部没有“赤道南地半球之图”的标题等等,主要是因为缺盖耶稣会印章而主张“工人摹刻本”说。但是[川村 1988]对“工人摹刻本”一说极为怀疑而持否定的见解,并对其究竟是否刊本的问题提出疑问。

③ [D’Elia 1961]113—114页;Day 1995]111页;[黄·龚 2004]143—144页。

④ [Day 1995]113, 116页注57;[黄·龚 2004]146页。此外,该残图与Vatican II的关系也很微妙。

⑤ 该目录说明如下:“DCCLXX. Koun yui wan go tsyuan tou, Carte générale sur 6 feuilles longues de deux et large d’ une toise, composée par les missionnaires catholiques, dans le même carton avec no. DCCLXIX”(770号,《坤舆万国全图》,天主教传教士所制世界图,6块条幅,2 x 1 toise[1 toise=1.949m]。与769号在同一文件夹。)[海野 1985]根据Дорн目录的该记载,指出俄国也可能有现存的李之藻版的《坤舆万国全图》。

⑥ [Яхонтов 1993]29页。

⑦ 这是波兰的天主教神职人员Józef Andrzej Załuski (1702—1774)及Andrzej Stanisław Załuski (1695—1758)兄弟的收藏品,1847年于华沙在扎乌斯基图书馆得以公开,后来该馆成为波兰的国家图书馆。但于1795年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所接管被移送到圣彼得堡。1921年根据里加和约由前苏联还给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受到来自德国的华沙大空袭而被烧毁。

后,可以说前者的价值无疑是该馆第一。

那么杜布罗夫斯基是如何获得这些珍贵的收藏品呢?杜布罗夫斯基 1754 年 12 月 9 日生于基辅,1772 年毕业于当地的宗教学校^①。他原来就希望到外国的大学学习,在 1778 年获得巴黎的俄国教会职位的同时,开始在俄国全权大使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巴里亚京斯基公爵(И. С. Барятинский)的事务所工作^②。随后于 1780 年成为大使馆的正式职员,在职中历任记录员、翻译官、顾问官、秘书官^③。他定居巴黎后,很早就与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狄德罗(Diderot, 1713—1784)、卢梭(Rousseau, 1712—1778)等代表当时法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深交,卢梭还赠送给他珍贵的书籍^④。此外还与许多权贵及学者交往,估计他在此过程中通过各种



彼得·杜布罗夫斯基

(采自[РНБ 2004])

途径致力于搜集古代的写本,不过详细情况不明。然而不久法国大革命的风暴就席卷巴黎全市,大量的古代写本从旧势力根据地的教会外流。这对杜布罗夫斯基来说是千载一遇的大好机会。当时圣日尔曼德批(Saint-Germain-des-Prés)教堂集中了历代各地的许多收藏品,藏储宏富蔚为奇观,却受到革命余波的冲击而大量外流。其中有许多归于杜布罗夫斯基之手,成为其收藏品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另外,革命的导火索是对巴士底狱的袭击,此后大量的警察方面的文件与秘密文书等被扔到其里院,人们置之不理,据说士兵们还坐在文书上吃饭,杜布罗夫斯基几乎是免费获得了其中的许多文书^⑤。总之,由于置身于再也难得的历史转折点,杜布罗夫斯基在长达十二年的旅居巴黎期间获得的收藏品,作为个人的收集可以说在质和量上都是惊人的。

1792 年 8 月 10 日,打倒君主制度的人民起义终于爆发。杜布罗夫斯基带着大使馆的文件与其自身苦心搜集的古代写本的一半左右,离开巴黎逃到布鲁塞尔。从那里又转到海牙,居留至 1795 年,再到汉堡,接着于 1800 年渡海到达伦敦,终于得以坐上前往圣彼得堡

① [Луизова 1952]150 页;[François 1959]334 页。

② [Луизова 1952]150 页;[Thompson 1984]480 页。

③ 同上。

④ [Thompson 1984]480 页。

⑤ [Thompson 1984]483 页。

的船^①。

仓惶逃离巴黎的杜布罗夫斯基托与自己有交往的多尔梅松·德努瓦索(Arne-Louis-François de Paule Lefèvre d'Ormesson de Noiseau, 1753—1794)^②保管其收藏品的另一半,但1784年他被处刑,其藏书包括杜布罗夫斯基之物都被付诸拍卖。杜布罗夫斯基当时在国外,与巴黎的代理人取得联系,得以收回若干写本。后于1803年请丹麦的驻巴黎全权大使德赖尔(Dreyer)经由汉堡将书送去,这些古代写本于1805年终于到达圣彼得堡^③。

杜布罗夫斯基在旅居巴黎期间获得的写本之中,有少量是以亚洲各国文字书写的^④。当然其中多数是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之类的书籍,也有极少一部分是汉语的书籍,其中就包括了《坤輿万国全图》。该图或许是杜布罗夫斯基得自巴黎之物,遗憾的是不清楚原藏于何处。附带提一下,菲利普·罗宾逊旧藏本原来是耶稣会的克莱芒学院(Collège de Clermont)的藏品。耶稣会解散后的1762年,该学院的全部藏书都被付诸拍卖,为荷兰人加拉德·米尔曼(Gerard Meerman)以惊人的低价买下。而且1824年米尔曼的藏书出售之时,约有四分之三为托马斯·菲利普斯(Thomas Phillipps)所购得。其后于1887年,菲利普斯的藏书被出售,多被收入公家机关。由于数量实在太多,无法全部卖出,有关中国的部分在1946年全数归于菲利普·罗宾逊之手,利玛窦的地图就包括在其中^⑤。由此可见,菲利普·罗宾逊旧藏地图可以详细追溯其来历,而且据说罗宾逊所买的那批书中有菲利普斯亲手写的“耶稣会士南怀仁文书”^⑥,如果此说属实,则可认为包括地图在内的这批书是南怀仁由中国寄到巴黎的耶稣会学院之物。杜布罗夫斯基从巴黎带回的地图,恐怕与罗宾逊旧藏本一样,都是耶稣会士寄自中国之物。

二、地图的特征

圣彼得堡的《坤輿万国全图》仍是印刷后的原样,未被装裱,也完全未施彩色。共有6幅,其中第三幅^⑦于正中央破裂成为两片,“无福岛”右侧的三行说明的下半部分略有缺损,此外均是完好无缺的。

6幅地图的下部分别标有a—e的拉丁字母与1—6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的标示分别对应了第1幅至第6幅^⑧,当是知晓汉字之人所记。另一方面,a—e的排列如下图所示,

① [François 1959]335页。

② 法国学士院会员、皇家图书馆馆长,作为贵族议会议员反对激进的革命,1794年被送上断头台。

③ [François 1959]336页。

④ 参照[Vasilyeva 1996],[Васильева и Ринсар 2006]。

⑤ [D'Elia 1961]109—113页。

⑥ 据[Day 1995]111页,原文是“the original papers of the Jesuit Verbiest”。

⑦ 现自右向左数,因此第3幅是指右起第三个条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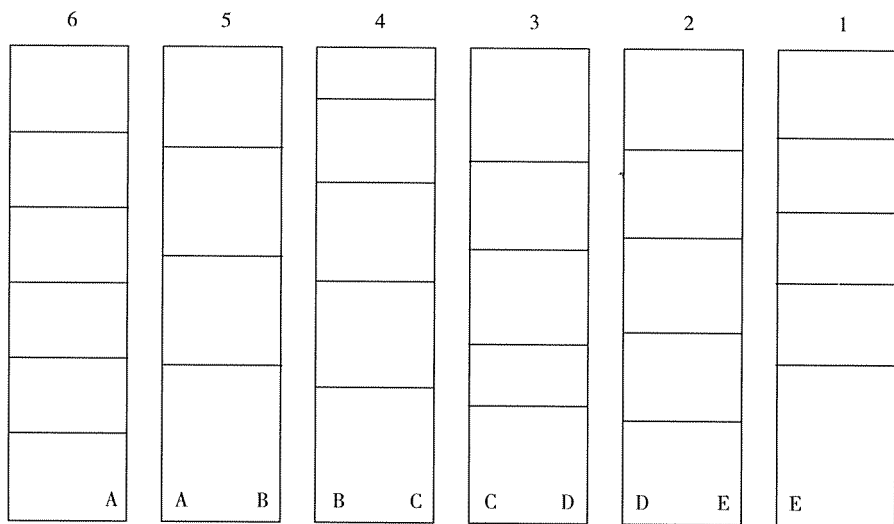
⑧ 背面也有铅笔写的阿拉伯数字,不过顺序相反。

而且其顺序是从第 6 幅标到第 1 幅(即自左向右),并未考虑到汉字的“第×幅”的记载,估计是懂汉字之人所标的,可以认为这些拉丁字母只是表示这 6 幅地图的那两幅是相连的,并不表示各幅的顺序(参照下图)。

第 6 幅的背面贴有小纸片,写有“китайская отд. IV No. 28”(中国部 IV,28 号)。根据图书馆的说明,作为 19 世纪前半叶之物,这是 Дорн 的目录以前的早期编号。此外,装有该地图的纸夹子上写着 1051 与 1052 两个号码,后者是利玛窦图的号码^①。

各幅版面框高 165.5—166.5cm,宽 62—62.5cm^②,此外印刷所用的纸大小为 146.5 x 66cm,由于高度不够,下部用纸粘贴接上,达到 179cm 左右^③。

关于版片的使用片数,各幅有所不同,在 4—6 枚之间,大小也不统一。不过实际印刷之时,似乎是将各幅版片组装起来,印在事先粘贴接好的加长纸上。海野一隆复原了万历三十年李之藻刊本的版片构成,画图加以表示^④。其见解大致是妥当的,不过仔细观察后可知,第一幅的版片似乎不是 6 片而是 5 片,亦即海野所谓的第 5 版片与第 6 版片实际上是一个版片。之所以看起来像有两片,是因为纸的接缝处呈线状,着墨情况不好。因此版片的构成如下图所示。



而各个版片的大小如下表所示。

- ① 附带一提,1051 是毕方济 (Francesco Sambiasi) 的《坤輿全图》,现在另行保管。相当于 [Dorn 1852] 的第 769 号、[Яхонтов 1993] 的第 14 号。学者认为毕方济的《坤輿全图》有两种版本,这是第二种。参照 [Heirman et al. 2011]。
- ② 由于未加装裱,难以测定正确的尺寸,测量时各幅的数字难免有若干出入。
- ③ 因未亲见其他刊本,难以断定,不过根据照片可知纸的粘贴加长的情形似乎各幅都有。
- ④ [海野 2005]126 页。

	第 1 片	第 2 片	第 3 片	第 4 片	第 5 片	第 6 片	全长
第 1 幅	27	27.5	28	28	55		165.5
第 2 幅	35	30.5	34	31.5	34.5		165.5
第 3 幅	39.5	34.5	40	15.5	35.5		165
第 4 幅	15	21.5	40.5	42	47		166
第 5 幅	38	37	36	55			166
第 6 幅	29.5	27.5	28	27	26.5	26.5	165

[海野 2005]探讨了日本传存的《坤輿万国全图》的摹本,发现它们几乎全是原刻初版本的摹写,但一般认为是万历三十年刊本的现存诸本,实际上并非原刻初版本,而是修改了几个地方的修订版。初版本马上经由澳门被送到日本的耶稣会士之处,据此制作了现存的这些摹本。当然修订版并非重新雕版,而是在初版本的版片上嵌上木片加以订正。海野又检查了现存的摹本,指出修订先由李之藻进行,此后利玛窦又做了修订。总之这两次修订是在初版刊行的万历三十年(1602)7月至李之藻与版片都离开北京的万历三十一年(1603)之间的一年以内进行的^①。

根据海野所述,关于第一幅第一片“九重天图”的第八“二十八宿天四万九千年”,根据初版制作的摹本作“二十八宿天七千年”,第三幅的李之藻序文的第一行“唐贾南皮画寸分里”、第二十二行的“异人异书世不易遣”,初版分别作“元朱思本画方分里”、“语不云乎在夷则进”。海野认为序文的这些更改是李之藻本身所做的,意在显示中国早已建立了科学的地图学。

而第六幅的葡萄牙的国名,初版写作“拂郎机”,西方的海上又有“拂郎机乃回回误称本名波尔杜曷尔”的说明,修订版将国名改为“波尔杜瓦尔”,抹去不需要的说明,这被认为是利玛窦所做的修订。

总之,初版的状态只能根据摹本得知,刊本则没有保存下来。对于这个问题,海野也指出是因为初版其实近乎试印版,其印数极其有限^②。无庸赘言,俄藏的地图当然也是修订版。

关于《坤輿万国全图》,上文已经提到,李之藻版之外尚有据说是清代的一种摹本。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及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所藏之图被认为就是此本。那么圣彼得堡本是否可能与这些地图一样均为清代版本呢?

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本很早就被介绍给学术界^③。[Giles 1918—1919]将地理学会本与梵蒂冈本进行比较,指出前者:

① [海野 2005]101—112 页。

② [海野 2005]112 页。

③ [Baddeley 1917]、[Giles 1918—1919]。

- (1)第四幅的“大明一统”作“大清一统”；
- (2)同是第四幅，中国东方的海域不作“大明海”，而作“大青海”；
- (3)同是第四幅，关于中国的说明文字“大明声名文物之盛……”的“大明”改为“中国”；
- (4)第二幅下部的数表“总论横度里分”中可见4处数值的误记。

该文主要根据(1)—(3)认定该地图为清代的再版。

此后经过很长的时间，1988年川村博忠仔细检查了过去未被探讨的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地图，指出其与万历三十年的李之藻版之间存在如下差异^①：

- (1)在第四幅中，表示中国的记载“大明一统”作“大清一统”；
- (2)第二幅下部的数表“总论横度里分”中可见4处数值的误记；
- (3)在第六幅的左上端的附注中，“比图具有度数尺寸”的“尺寸”，维也纳本误作“尺十”。

其中(1)、(2)是与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本相同的特征，(3)是维也纳本独有的特征。而地理学会本的特征(2)不见于维也纳本，仍作“大明海”。川村认为(1)的“大清一统”的“清”字是以毛笔所做的修改^②，维也纳本才是所谓的工人摹刻版^③。川村又新发现了地理学会本中标题的“坤輿万国全图”作“城輿万国全图”这一明显的特征。

其后，青木千枝子本身再次对维也纳本进行调查，发现了川村未指出的许多不同点，如第6幅第3片的“仙多默岛”作“圣多默岛”，第四片的“仙劳冷祖滨”及“仙衣力拿岛”分别作“圣劳冷祖滨”及“圣衣力拿岛”等^④。作为调查的结果，青木做出比较详细的结论，即维也纳本是工人摹刻版修复版的清代修订第一版，地理学会本则是对此做了进一步修订的清版^⑤。

对于修订部分是改刻还是手写的订正会有不同的认识，而这可能对这一类判断产生重大的影响，实际上[海野 2005]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详加讨论^⑥。

以上的论述或许有些偏题。总之上文所举出的清代修订版的特征在圣彼得堡本中一个也未发现，不妨断定圣彼得堡本是李之藻的万历三十年版。可以说这次在此介绍的俄藏《坤輿万国全图》是已经确认现存的该版本的第七种。

那么万历三十年李之藻刊刻的七种《坤輿万国全图》之间是否没有任何差异呢？当然此处所提的问题并非有无彩色与装裱形式的不同，而是版刻的不同点。青木千枝子对日本现存的三种印本及梵蒂冈本进行详细的比较，确认了除印刷时期早晚不同导致鲜明程度不同

① [川村 1988]23页。附带一提，该地图是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6—1696)献给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 1640—1705)的。殷铎泽于康熙十年(1671)向耶稣会总长报告了中国传教的情况，为获得更多的支援而出使欧洲，康熙十三年(1674)再次回到中国。

② [川村 1988]29页。另一方面，据川村所述，地理学会本是以刊刻形式做出的订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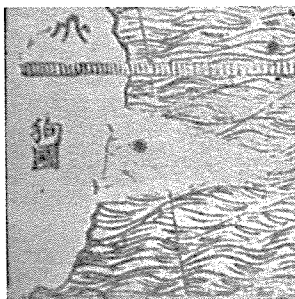
③ [川村 1988]32页。

④ [青木 1994]。

⑤ [青木 1994]57页。

⑥ [海野 2005]123页以下。

以及虫蛀导致文字与图形的逸失以外,这些均为同一版本^①。看来其结论似乎可予肯定。然而就是用相同版片进行印刷,在实际印刷之时,由于对版片做了若干加工,也会产生些许差异。在此试举一例。以下是见于第三幅第一片左部的“狗国”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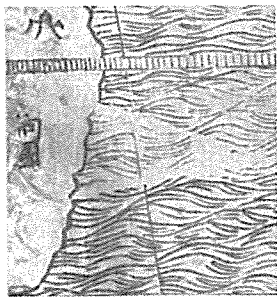
梵蒂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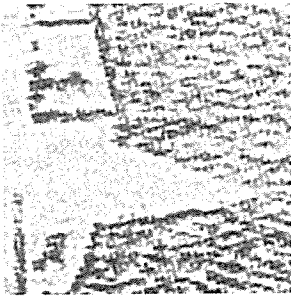
宫城本



京大本



明尼苏达本



罗宾逊本



圣彼得堡本

万历三十年版的版片中,似乎狗国的海上原来就有三角形的缺损。梵蒂冈本与宫城本是一类,缺损未被修补,未画上海水的波纹。而在印刷时嵌上木片补上波纹的是京大本与明尼苏达本^②。至于内阁文库本,笔者写此文时未能得到清晰的照片,因此未予举出,不过根据[黄·龚 2004]127页的图版,似乎属于梵蒂冈本与宫城本那一类。值得关注的是罗宾逊本和圣彼得堡本,两者该处不仅三角形的部分未被填补,而且不见“狗国”的国名^③。

换言之,现存的七种万历三十年版《坤舆万国全图》可以根据该处的补刻状态进行分类,可分为第一次印刷、第二次印刷、第三次印刷等类。罗宾逊本与圣彼得堡本是完全未补刻缺损者,梵蒂冈本、宫城本、内阁本为补刻了“狗国”的国名与些许海岸线者,最后京大本与明尼苏达本在国名以外还补上了三角形部分的波纹者。那么罗宾逊本与圣彼得堡本是否第一次

① [青木 1993]107—110页。

② 京大本的禹贡学会影印版(因此同于[黄·龚 2004]所收本)中做了许多修补,需要加以注意。此处也做了相当好的修补。

③ 罗宾逊本据[Sothorby's 1988]。由于对小幅图版做了放大而显得不清晰,但可以看出自“狗国”至海上的三角形是连续缺损的。又关于圣彼得堡本的书影,蒙俄国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波波娃所长的帮助,特此鸣谢。

印刷呢？其实未必能这样说。因为嵌上木片的补刻，可以认为是在组装版片时镶嵌后再印刷的，纯粹是忘记这一工序或木片部件后来已经失去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出现在圣彼得堡本上的版片干燥而致的裂痕比宫城本与京大本更大^①，考虑到这一因素，可见其印刷时期较迟。而考虑[青木 1993]等所做的全面观察，可以认为印刷顺序应当如下：

第一次印刷 梵蒂冈本，宫城本，内阁本

第二次印刷 京大本，明尼苏达本

第三次印刷 罗宾逊本，圣彼得堡本

小 结

万历三十年刊刻的《坤輿万国全图》并非只印一次就结束的。小文认为，包括新发现的俄藏图在内，对现存的七种地图可以进行自第一次印刷至第三次印刷的分类。同时不否定现已失传的其他印本存在的可能性。李之藻于万历三十一年7月，作为福建学政赴任时，将《坤輿万国全图》的版片带回故乡杭州^②。因此在北京之外一定还在杭州进行印刷。当然，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定看来属于后来印成的罗宾逊本与圣彼得堡本就是在杭州印刷的。然而想到两者原来都在法国，又都是第三次印刷，至少会让我们有理由想象它们都是由法国耶稣会士带去的。

引用文献

[洪业 1936] 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3、4合期，1—50页；后收入《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150—192页。

[黄·龚 2004] 黄时鉴、龚纓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孝聪 1996] 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青木 1993] 青木千枝子《我が國に現存する〈坤輿萬國全圖〉の刊本に關する一考察》，《汲古》第23号，汲古书院，107—113，100页。

[青木 1994] 青木千枝子《オーストリア國立圖書館所藏の〈坤輿萬國全圖〉について》，《汲古》第25号，汲古书院，52—57页。

[鲇泽 1953] 鲇泽信太郎《マテオ・リッチの世界圖に關する史的研究——近世日本における世界地理知識の主流》（横滨市立大学纪要第18号）。

[海野 1985] 海野一隆《明・清におけるマテオ・リッチ系世界圖》，《東西地圖文化交渉史研究》（大坂：清文堂出版株式会社，2003年），33—92页；原刊于山田庆儿编《新發現中

① 例如第一幅第一片中的“坤輿万国全图”标题部分的裂痕。

② [D'Elia 1949] Vol. 2, 60页。

國科學史資料の研究(論考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5年)。

[海野 2005] 海野一隆《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の諸版》,《東洋學報》第 87 卷第 1 号, 101—143 页。

[川村 1988] 川村博忠《オーストリア国立図書館のマテオ・リッチ世界圖〈坤輿萬國全圖〉》,《人文地理》第 40 卷第 5 号,17—37 页。

[土浦市立博物館 1996] 土浦市立博物館編《第 16 回特別展圖録:世界圖遊覽——坤輿萬國全圖と東アジア》,土浦市立博物館。

[Baddeley 1917] J. F. Baddeley, Father Matteo Ricci's Chinese World - Maps, 1584—1608,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50, No.4, pp.254 - 270.

[Day 1995] John D. Day,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of Matteo Ricci's Maps, *Imago Mundi*, Vol. 47, pp.94 - 117.

[D'Elia 1938] Pasquale D'Elia, *Il Mappamondo cinese del P. Matteo Ricci S. I.*, Città del Vaticano: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D'Elia 1949] Pasquale D'Elia, *Fonti Ricciane*, Vol.2, Roma :Libreria dello Stato.

[D'Elia 1961] Pasquale D'Elia, Recent Discoveries and New Studies (1938—1960) on the World Map in Chinese of Father Matteo Ricci SJ, *Monumenta Serica*, Vol. XX, pp.82 - 164.

[Dorn 1852] B. A. Dorn,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et xylographes orientaux de la Bibliothèque Impériale publique de St. Pétersbourg*, St. Pétersbourg: Imprimerie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François 1959] Michel François, Pierre Dubrowsky et les manuscrits de Saint-Germain - des - Prés à Leningrad, *Mémorial du XIVe centenaire de l'abbaye de Saint-Germain - des - Prés*, Paris:J. Vrin, pp.333 - 341.

[Giles 1918—19] Lionel Giles,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World Map of Father Ricci,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52, No.6, pp.367 - 385; Vol.53, No.1, pp.19 - 30.

[Heirman et al. 2011] Ann Heirman, Paolo De Troia and Jan Parmentier, Francesco Sambiasi, a Missing Link in European Map Making in China?, *Imago Mundi*, Vol. 61:1, pp.29 - 46.

[Sotherby's 1988] *The Library of Philip Robinson Part II: The Chinese Collection* (Auction Catalogue). (《罗氏图书珍藏》)

[Thompson 1984] Biography of a Library: The Western European Manuscript Collection of Peter P. Dubrovskii in Leningrad, *The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Vol. 19,

No. 1, pp. 477 – 502.

[Vasilyeva 1996] O. L. Vasilyeva, Oriental Manuscrip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Manuscripta orientalia*, Vol. 2 No. 2, 19 – 35.

[Васильева и Ришар 2006] О. В. Васильева и Ф. Ришар, Петр Дубровский и восточные рукописи его коллекции // История в рукописях и рукописи в истории.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к 200-летию Отдела рукописей РНБ, СПб. :Изд-во РНБ, С. 8—25.

[Воронова 1973] Т. П. Воронова, П. П. Дубровский и Сен—Жермен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 Книги, архивы, автографы: обзоры, сообщения, публикации, М.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нига», С. 101 – 114.

[Луизова 1952] Т. В. Луизова, Собрание рукописей П. П. Дубровского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убли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 имени М. Е. Салтыкова — Щедрин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8, С. 150 – 154.

[РНБ 2004]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Петр Дубровский (1754—1816) и его коллекция, СПб. :Изд-во РНБ.

[Яхонтов 1993] К. С. Яхонтов, Китай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Публи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СПб. :Изд-во РНБ.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编

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

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 —北京:中华书局,
2012.6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

ISBN 978-7-101-08511-2

I. 舆… II. 北… III. ①李孝聪-纪念文集②中
国历史:古代史-文集 IV. ①K825.81-53②K2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2645号

书 名 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
编 者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丛 书 名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
责任编辑 王 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6月北京第1版
201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8×1091毫米 1/16
印张43½ 插页8 字数900千字
印 数 1-15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511-2
定 价 129.00元
